

制琴与铸舰

——父亲司徒傅权的强国梦

赴美留学自谋生计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农历八月初九，父亲司徒傅权出生于上海，天生清秀端庄，双目有神，一家大小无不欢喜，祖父母甚是疼爱。

父亲字梦岩，全家老小都叫他司徒梦岩，而不叫他的学名。兴趣广泛，少年时期即充分展现精力充沛、多才多艺的一面。在家族的全力支持与栽培下，他参与各种课外活动。年少时酷爱广东音乐，对吹、拉、弹、唱都有所涉猎，很早就学会拉二胡，弹三弦，敲扬琴，吹箫、笛等民族乐器，哼吟粤曲唱段，亦谙京剧，十几岁时，还跟上海徐家汇教堂传教士学过小提琴，成为中国最早一批接触小提琴和西乐的人。

1904年，16岁的父亲以自费的方式赴美留学，初到美国波士顿，在安德瓦（Andover）一所私立的菲力斯学院（Philips Academy）就读大学预科。

菲力斯学院位处波士顿北郊21英里处，创校于1778年美国独立革命时期，是历史悠久的顶尖贵族中学，有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预备中学的美誉，在其历届培养的毕业生中，有包括来自世界26国的留学生。

原本父亲计划读完两年预科后，再决定要如何选科入大学，但不幸第一年还没有念完，父亲就收到祖父司徒怀德汇来的300美元和两封家书，说明司徒源记经营不善，家中事业遭逢骤变，已一无所有，汇来300美元是给他作为归

国旅费的。不过祖父并未命令父亲即刻回国，只是告诉他，若不愿回来，以后就得自谋生计了。

对一个自幼出身富商之家又毫无谋生能力的年轻人，乍时沦落到流落海外、举目无亲的境地，无疑是晴天霹雳。经过几天思考，父亲眼见美国一切都比中国进步，他认为再困难都应该要待上几年，学好本领才回家，在祖国努力奋斗，实现强国理想。显然，父亲遗传了祖亲沉着、冒险的性格，在这个命运交叉点，他选择迎向挑战，很笃定地相信自己一定有法子渡过这个难关。

他选择节流，转读一所专为穷困学生所办的免费学校，和许多贫困的美国孩子在一起念书，这所学校学生多为有色人种。除了读书，他们必须完成学校指定的许多特定工作，包括割草、采果、清洁卫生等杂务，甚至帮警察侦察追踪一些“特殊人物”。学校则负责他们的全部食宿。

父亲也通过暑假工读开源。他充分发挥了过去身为富裕少年时所学到的本事，协助记者冲洗底片或到教堂里为对中国文化好奇的美国人，宣讲中国孔孟的学说，这些打工的工作，都为他赚得微薄的生活费。

另外，父亲也奋力苦读，以优异的成绩争取奖学金，并再回菲力斯学院修习完预科的学分。

在美求学期间，父亲喜爱音乐的心从未停歇，他先是利用课余时间与时波士顿了交响乐团（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小提琴手贝利学习提琴，贝



留学时代的司徒傅权（摄于1908年）

利对父亲的乐感、吸收能力十分欣赏，当他要离开波士顿到另一乐团出任首席时，就把爱徒转介绍给自己的老师——尤根·格鲁恩贝格（Eugene Gruenberg）教授。

格鲁恩贝格是一位奥地利小提琴家兼作曲家，由于他当时已是一位名师，很少收私人学生，但听过父亲的演奏后，被他那超常的乐感所吸引，很快答应收父亲为徒。

只是不到一年，父亲已身无分文，他很愧疚地告诉格鲁恩贝格，自己已没有能力支付学费，但教授鼓励这名好学的中国学生继续学琴之路，甚至愿意不收学费，只要父亲在上课前打扫整理教室即可。

进入MIT读造船工业

父亲拮据地念完了两年大学的预科，并顺利通过了美国当时最严格的大学入学考试，进入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就读，主修机械工程。

清宣统元年（1909），21岁的父亲在MIT已读了两年。暑假期间，他发现就近的镇公所正举办一个数学比赛，既不收报名费，外国也可以参与，父亲便和同学一起报名。一星期后，成绩

公布，父亲得到第一名，并收到一套绘图的仪器作为奖品。

中国人获得这场优胜的消息，引起不小的轰动，而且传到当时清廷驻美公使伍廷芳的耳里。伍廷芳非常高兴，虽然那仅是寻常乡镇的学术活动，但当时美国人普遍认为中国人只是留长辫裹小脚的民族，在这种气氛下，伍廷芳因而认为中国人打败美国人赢得比赛优胜，是极为光荣的事。我的长兄金城在回忆父亲文中记述：

父亲说，那时伍廷芳知道消息十分兴奋，立刻派人详查他的背景，知道他是一位半工半读的穷学生时，相当同情他。不久伍廷芳当面接见他，特别关心他学习生活的苦境，立刻决定颁给他奖学金。伍廷芳翻阅公费学生名额，确知当时仅剩有海军部造船工程的空额，便问他是否愿意转科学习。

虽然，为了符合海军部奖学金这个公费生的项目，父亲必须转为主修造船工程，并需在麻省理工学院再待四年，但公费留学，每个月可领好几十块的生活费，这与他之前工读的苦境简直是天壤之别。

此后父亲在 MIT 努力学习造船、船机，兼修有关海军工程的学科如轮机工程学 (Marine Engineering)、军舰建造 (Naval Construction) 等技术，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来回到中国成了一位真材实料的造船全才。

制琴大师的中国弟子

因为有公费资助留学，父亲在经济上有了富余，又可以额外发展自己的兴趣了。

在格鲁恩贝格的教导下，他提琴演奏技巧渐入佳境的同时，开始感觉到自己手中的小提琴质量太差，进而萌发了要自己做提琴的想法。

父亲有一个同学的父亲开设了一

间制作小提琴的作坊（我的记忆中，该小提琴作坊可能名为 Musicians Supply Co.）。在 1910 年的暑假，父亲征得同学父亲的同意，就到该作坊去学习制琴。刚开始时，他只能用废旧的肥皂木箱板刨坯，但由于他有木工的基本功，做起来有模有样，手工很精细，引起一位老人的注意。

原来这位老人就是当时鼎鼎有名的美籍波兰裔小提琴制造家华特沙朗·戈斯 (Walter Salon Goss)。起先，戈斯以为父亲是提琴作坊雇用的日本工人，经询问后才知道父亲是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的中国籍学生，而且完全出于个人的兴趣前来学习小提琴制作，戈斯为此对父亲产生好感，父亲亦十分倾慕戈斯。为慎重起见，戈斯要父亲陪他先到教堂郑重宣誓：“为师者戈斯对学生悉心传授，绝不隐私藏秘；为徒者学成后，绝不在美国开业造琴。”后来，师徒两人，真心信守诺言一辈子。

在戈斯指导三年后，27 岁的父亲制作出一把出自中国人之手的优等小提琴，并以师父戈斯的名义参与 1915 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世界博览会 (World's Fair) 荣获金奖，让戈斯荣膺美国当代最优秀小提琴制造家的称号。这把琴目前保存在华盛顿 D.C. 博物馆的艺术馆内。

父亲一生究竟做过多少提琴，我们从未听他说过。只知道他在学习制琴时，曾仿制不同的名古琴，以研究测试不同名琴的特性，而这些制作的小提琴大部分都在美国送人了。而家中看到过的是父亲带回中国自认为最满意的三把提琴，还有一把是戈斯亲手作的，师徒两人分别时，互换留作纪念的；以及他私底下自制两把小提琴换来的法国制弓大师托尔特 (Francois Tourte, 1747-1835) 制作的一支名弓，这些珍藏，全都在 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因住所被日寇蓄意纵火而全部烧成灰烬，这使父亲非常痛心。

父亲一辈子从未卖过自己制作的小

提琴，充分地恪守徒弟对师父的誓言。目前我们所仅能见的是他在世时，曾借给朋友一把仿制 switzer 的琴，因幸免于战火而保存下来，现由居住在美国的孙子司徒达宏所收藏。

波士顿船厂惊险一幕

父亲在麻省理工学院求学期间成绩优异，后来被分派到波士顿船厂实习的表现也极为突出，因此船厂破例让他能长时间参与船厂各部分的作业，其中包括参与三艘万吨轮的部门设计、参加总设计的研究和定案会，这过程奠定了父亲日后成为理论与实务都能精确掌握的优秀工程人才。

1914 年，26 岁的父亲一毕业，就被分派到波士顿一个大造船厂工作，并被聘任为工程师。在此工作期间，父亲再次面对一个惊险的状况。

在波士顿船厂工作时，有一次父亲和他一位意大利籍的同事，按惯例下船舱作船下水前最后一次机械检查，当检查出问题时，必须要拉信号绳通知船板上的人，否则到了规定的时间，船就要放水。这一天他们检查到最后，发现船有问题，因而马上跑去拉信号绳，但不知是用力过猛还是另有原因，信号绳掉下。这把两人急坏了，因为按原规定，放水的时间就快到了，如果不设法通知船板上的人，船一放水，肯定船毁人亡，这时意大利友人早已吓得腿软，紧紧抱着父亲，惊问该如何是好。勇敢的父亲毫不慌忙，他对友人说，你放开我，我跑得快，可以用最快的速度从逃口跑上甲板通知上方的人，你镇定一下，跟随我从逃口跑上来，一定不会有事的。果然友人松手，镇定了下来，父亲身手矫健迅速地跑上甲板，避免了事故的发生。事后这位意大利朋友感激父亲是他的救命恩人，因此专程请父亲到家中吃他母亲煮的通心粉，父亲体验这份深厚的情谊，但却不习惯吃通心粉，他说吃通心粉，这辈子可就是这一回，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

江南造船厂当家工程师

1915年,27岁的父亲返国,受父母之命完婚,即带着新婚的妻子前往上海出任江南造船厂工程师,两人在虹口一带安家。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正是“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本着“实业救国”的理念,应曾国藩之邀所筹办的江南制造局中的船坞,进入留学生前辈本着与自己相同理念所筹办的机关,对父亲来说,真是没有比这更好的出路了。

1915年,中国江南造船厂的制造技术,仍完全掌控在洋人手里,其中为首的是总工程师——英国人摩根先生(Mr.R.B.Mauchan)。

当时摩根主要负责招揽订购船只的业务,确保造船材料向英国订货;而且各项工程技术方面图纸、技术指标,都要摩根做最后的确认。那个年代,凡是江南厂设计的造船图纸,都必须由摩根签名送英国船舶保险专业公司劳合社(Lloyd's of London,现译名为劳依兹保险社)审核评级,最后订出应交的保险费,返回江南厂后才能生产。

父亲司徒傅权前往江南造船厂报到上班。过了几天,一个衣着随便的英国中年人,经常前往父亲工作室问东问西,而且态度轻慢毫无礼貌,原本父亲不以为意,但后来不胜其扰,只能下逐客令:“Mind your business, get out!(别管闲事,出去!)”把这英国人赶出了门。

原来这位英国人正是当时江南造船厂的总工程师摩根。据事后同事们告诉父亲:摩根认为这位刚从MIT毕业的毛头小子,恃才傲物,竟敢不把他看在眼里,甚至开口叫他滚蛋。于是就打算伺机挫挫这个年轻工程师的锐气。当造船厂接到一个订单(可能是在华英商祥泰木行向江南厂订购,专门装载木材的货船,排水量三千吨左右,共订三艘),摩根就把这项设计任务交给了父亲,据说江南厂过去少有一个独当一面设计的做法,这显然是有“考验”这个年轻人的意图。

父亲不知摩根的用心,还认为这是很普通的一项工作,他独自认真地完成这项设计后,就按他在美国波士顿船厂工作的习惯,在图纸上右下角用英文签上自己的名字F.C.Seetoo,这一回再次惹恼了摩根,因这违反了原有的惯例。没想到这个设计图纸批复返回江南厂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张图纸获得的评级是最高级——A级,这是江南造船厂有史以来从未得到过的荣誉,因过去送审的图纸能通过的几乎都是C级。这次获得最高的评分,摩根非常高兴,一改过去对父亲的看法,而且亲自到父亲的工作室向他道贺,并向全厂公开宣布这一喜讯。

摩根与父亲的友谊从不打不相识开始,经过一连串的考验,最后结成莫逆之交。日后,摩根对父亲十分倚重,在专业技术上遇到问题一定要先听取父亲的意见。1926年,当摩根退休离任时,正式向厂方推荐38岁的司徒傅权担任总工程师,当时也是江南造船厂第一位华人造船总工程师。

1917年,父亲29岁,并已在江南造船厂工作了两年。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局势诡谲,当时不独中国受到内忧外患的威胁,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被卷入战争的危险。以美国为例,因有在远东运送军用物资之需,拟订购四艘万吨以上的运输舰。当时在远东,造船能力首推日本,日本虽是协约国成员,但与德国的关系暧昧,美国海军部迟疑不决,未向日本下订单,而寻找其他途径。

摩根获悉此消息,便再找上父亲,要父亲认真考虑江南造船厂是否有能力承接这个订单。

父亲告诉摩根,他在美国MIT毕业前后三年(1913~1915),曾在波士顿最大的船厂参与过设计,建造过一万吨以上的船舰多艘,自身还是有相当经验的。摩根立刻请司徒傅权详细地把造船经历写成文字资料,送交美国海军部驻沪办事处查验,打算碰碰运气。没

想到不久后,美国方面即回电认可。长兄司徒金城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个人认为,父亲的资料之所以能够迅速得到美国海军的核准,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美国海军部一定向波士顿造船厂查证过,因为父亲回国不久,原船厂厂长都认识他,自然会大力地推荐他;第二,MIT为美国当时最好的技术学校,父亲自MIT毕业,虽然技术尚浅,但也有一定的实力;第三,美国海军当时亟需建造这几艘运输船,在中国生产,是当时唯一最好的选择。

江南造船厂取得此订单,是有史以来首次设计承造万吨巨轮,可谓名利双收,但其中的艰辛只有亲自参与的人才能体会到。

父亲亲自主持包括船体、船机等设计,扩挖船坞、增造大批机械……也深入参与,这使父亲在美所学专长得到充分的发挥和体验,他做事向来仔细认真,事必躬亲,这阶段几乎是废寝忘食,据母亲周锦文的回忆,那段期间,父亲大部分时间吃住都在厂里,很少回家。

但这四艘船尚未到交货日期,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后来,这四艘运输舰并没有交付美国海军部,而由美国大来洋行收购,作为运输船。

有些记载指出,1956年中国才自行设计和生产制造的第一艘万吨轮,其实是把真正的史实记录往后推迟了38年。近来又出现江南造船厂早期生产的万吨轮是“外国人设计,中国人造船”的说法,经过严加考证就会知道当时为总工程师的摩根在承揽万吨轮订单方面确实出过力,但实际上摩根从不碰触设计,因此最准确的说法是1918年,中国江南造船厂已能自行设计和承造生产万吨轮,而主要设计师正是时年30岁的我的父亲——司徒傅权。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